

新世纪
学术文库

李亚娟 著

晚清小说与政治之 关系研究 (1902—1911)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文库

李亚娟 著

晚清小说与政治之 关系研究 (1902—1911)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小说与政治之关系研究: 1902—1911 / 李亚娟著.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 7

(新世纪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093 - 4648 - 8

I. ①晚… II. ①李… III. ①古典小说 - 关系 - 政治 - 研究 -
中国 - 1902 ~ 1911 IV. ①I207.41 ②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1136 号

策划编辑 马 颖

责任编辑 邱小芳

封面设计 蒋 怡

晚清小说与政治之关系研究 (1902—1911)

WANQING XIAOSHUO YU ZHENGZHI ZHI GUANXI YANJIU (1902—1911)

著者/李亚娟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 × 1230 毫米 32

版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张/12 字数/278 千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 - 7 - 5093 - 4648 - 8

定价: 38.00 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 010 - 66031119

网址: <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 010 - 66078158

市场营销部电话: 010 - 66033296

邮购部电话: 010 - 66033288

总 序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PUDONG, CELAP）是一所国家级干部教育院校。习近平同志要求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要按照国际性、时代性和开放性要求，在帮助学员树立国际视野、提高执政能力方面更有特色”，使学院努力成为“具有国际性、时代性、开放性特点的新型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和开展国际培训交流合作的窗口”。学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富有特色地开展干部培训，初步形成了以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为培训目的，以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精神为教学主线，以国际性、时代性、开放性为办学特色，以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为培训重点，围绕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讲新理论、新知识、新实践的干部教育的“浦东模式”。创办十多年以来，学院为国内培训了近十万名各级各类干部，为世界上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培训过党派领袖、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从而在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格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得到广大干部的好评和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

学院吸引和汇聚了一批优秀的教师，他们当中既有海外学成归来的学子，也有来自国内著名高校、科研机构的青年才俊。

几年来，他们秉持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凭着火热的创业激情和渊博的学识，以及对于干部教育培训事业的执着和热爱，默默耕耘和奉献，在高质量完成了教学任务的同时，笔耕不辍，在自己所属的学科领域精心耕耘，取得了累累硕果。他们近年来的学术研究通过对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现实问题的追踪，深入探讨理论前沿问题，及时总结实践领域有益的经验，为中国干部教育培训提供了许多鲜活的教材，并为探索中国未来发展之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学院组编出版过“中浦院书系”（四十余本）、“博士文库”（十余本），还有众多案例集和个人专著。此次编辑出版的“新世纪学术文库”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师近年来学术成果的又一次集体展示，是体现学院办学特色的学术成果集结。文库围绕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集中反映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理论、新知识和新实践。文库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政府职能转型与社会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领导力提升与建设、公共突发事件案例研究等理论前沿与社会热点问题。这些成果为探讨中国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所呈现的新景象、新问题、新态势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学院创新干部教育理论、丰富干部教育培训内容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值此文库付梓之际，我们衷心希望，此文库不仅可以为领导干部讨论现实问题和探索未来发展之路提供鲜活的思想源泉，而且对那些热衷于思考当代全球化及高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者与学习者有启发作用。我们也认识到，当今世

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我院教师的研究因此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希望我们的老师再接再厉，力争产生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为把中国建设成为更具活力、更具发展潜力、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国家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

冯 俊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序

四年前，李亚娟完成了博士论文《从介入到关怀：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演变（1902—1911）》的写作，通过了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她经过几年的努力，将博士论文修改为书稿《晚清小说与政治之关系研究（1902—1911）》。现在，她的书稿即将出版，这是很令人高兴的事。

晚清小说与政治之关系，这是近代小说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中国自有小说以来，各个时期的小说，都没有像晚清小说那样与政治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这不仅与近代这一历史阶段的特殊性有关，同时也由近代小说的独特性所决定。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清王朝灭亡，近代总共只有七十二年，可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小说的形态却已由古代转换为现代。其实，更准确地说，直到同治末年，小说格局中才出现了新的因素，即该转换是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完成的。这种转换呈加速度发展态势，在近代的最后十年里变化尤为显著，也尤为关键，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晚清小说。

于是，一个问题油然而生：这种转换为何会在近代发生，而且发展势头又如此之迅猛？论及晚清小说时，易见的是小说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变化，而这种带有普遍性的变化，是由整个

小说发展系统的转换所导致。小说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发展实体，其形态、规模与行进轨迹同时受到了来自作者、小说理论、读者、出版与国家文化政策的合力的制约。从明末万历年间直至清同治年间，它们所构成的小说发展系统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而清王朝灭亡以后，已转换为现代小说的新系统也逐渐走向稳定。原有系统的动荡始于同治末年，西方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传入后，经过二十余年的竞争，终于取代了小说出版中长期以来普遍使用的雕版印刷。虽然此时新技术与设备主要用于传统小说的再版，但却因其价廉物美而使原有的读者群开始扩大，更重要的是，“出版”这个要素已在物质层面上为后阶段小说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做好了准备。随后，翻译小说作为一个连续性的运动开始形成，它为小说发展系统增添了新的要素。这些都使原有的系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但毕竟还不能从根本上撼动它。打破原有系统的平衡需要极大的能量，在当时，这种能量来自政治。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后签订了《马关条约》，随后则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庚子国变的发生与《辛丑条约》的签订，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已沉沦到亡国的边缘。时局激烈动荡，政治格局猛烈剧变，这种狂风暴雨式变化之力，或直接、或通过若干中间环节撼动了小说发展系统的平衡，于是在这特定的历史阶段，小说与政治这两个不同领域的变化，在逻辑上呈现出一定的因果关系，在时间上则显示出前后的顺序。由以上的介绍可以知道，“晚清小说与政治之关系”，实为近代小说研究中十分重要的课题。

李亚娟这本专著的价值正在于此。为了这个课题的研究，

她搜寻了大量的资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载于近代报刊的文献，鲜见于先前以往同类课题的研究。其时倡导政治小说最力者如梁启超诸人多集中于日本，故而他们在日本主办的报刊又尤为受到关注。李亚娟又甚注意在华传教士所办刊物上的小说资料，虽然关于在华传教士与小说的关系已有一些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但将它纳入近代小说与政治关系的视野中进行考察与论述，却是较新鲜的尝试，她认为传教士小说参与了中国近代小说的进程，但它在导致近代小说变革诸多要素中却较次要，这结论较为妥帖，因为拔高或抹杀都不符合实情。

通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梳理，李亚娟着重考察了近代最后十年的小说与政治的关系，根据其实际的变化情况，确定了该期间的几个关键时间点，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导“小说界革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晚清小说的创作与翻译开始出现“娱乐压倒启蒙”的态势，而由此直至宣统三年（1911）清王朝灭亡，两者相互并存。作者创作（或翻译）观念的改变，以及阅读市场的约束等因素，使那种最初仅着眼于政治宣传的大声喧哗，逐渐转向创作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小说从作为政治功用性的直接介入发展为潜在的关怀，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现实主义品格开始显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为追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将自己的研究前推至晚清，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作为标志性事件特别为他们所关注。然而，那些著述论及该时期小说发展时多为粗线条的勾勒，李亚娟书中指出的近代小说发展并未完全按照“小说界革命”所预导的路

径前行的事实，常为人们所忽略。“小说界革命”在提高小说地位，使人们开始重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方面起了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场“革命”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梁启超在编辑了三期《新小说》之后便远游美洲，这份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家小说专刊随后便严重愆期，^①而其第八号由吴趼人、周桂笙接手主办后，编辑方针已显然转向。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从《绣像小说》、《新新小说》到《月月小说》，这些小说刊物渐渐地离开了强调政治的宗旨，越来越注重读者的阅读趣味，到了《小说林》创办时，它更明确提出小说应该脱离政治轨道，回归本体。黄人尖锐地批评道：“有一弊焉，则以昔之视小说也太轻，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②稍后周作人更是直接批评梁启超：“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说始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篇。”^③待到宣统朝《小说时报》与《小说月报》创刊时，它们都不再像以往的小说专刊那般，发表“发刊词”或“缘起”之类的文字，慷慨激昂地宣称该刊将担负起何种历史使命，只是刊载简短的“通告”或“编辑大意”，强调的是“怡情悦性”^④与“材料丰富，趣味浓深”^⑤而已。总之，

① 《新小说》前三号按时出版，第三号后停顿了5个月才出版第四号，第六号与第七号之间相隔6个月，第七号与第八号之间又相隔5个月。

② 黄人：《小说林发刊词》，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小说林》第一期。

③ 独应（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七（1908年6月5日）《河南》第五期。

④ “新出《小说月报》”，宣统二年九月初八（1910年10月10日）《时报》。

⑤ “编辑大意”，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五日（1910年8月29日）《小说月报》第一期。

它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小说刊物。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在红火了两三年后，已被人渐渐淡忘了。

这其实是小说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清王朝行将灭亡之际，政治与小说曾有过十分积极的互动作用。梁启超着眼于政治而倡导“小说界革命”，使小说地位提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随之而来的是小说的迅猛发展；反过来，众多的小说作品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描绘了国家已沉沦到亡国边缘的图景，这些都刺激了广大读者关注乃至参与国家大事的热情，《新小说》出版后遭到清廷的禁毁，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政治与小说的关系。然而，政治与小说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两者的行进轨迹出现了交点。小说具有既是精神产品又是文化商品的双重品格，它的发展同时受约束于文学创作规律与商品交换法则。政治小说初行世之际，其形式新颖，内容则贴近现实的政治矛盾与社会矛盾，作（译）者又直截了当地畅发大胆的议论，故而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作品销量颇为可观。不过小说就是小说，它不可能长期地肩负政治重任蹒跚前行。当相仿于政治策论，且“开口见喉咙”^①式的作品接二连三地问世，读者对它也就逐渐厌倦了，出版界的兴趣便随之转向，利润的多寡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倾向于读者的娱乐需求，而这现象的实质，则是小说向本体回归的要求。此时，即使梁启超的声望再高，他也无法违拗文学创作规律与商品交换法则的制约。

① 中原浪子：《〈京华艳史〉序例》，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一（1905年2月4日）《新小说》第五期。

即使如此，梁启超在近代小说史上的地位仍应得到充分的肯定。他倡导的“小说界革命”虽有只重视政治小说的偏颇，但其巨大的冲击力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重新估量其地位、作用与影响。受到启发的爱国志士发现了新的可宣传其政治主张，以及开启民智、普及教育的利器，爱好文艺的人们寻得了展现其艺术才华的途径，小说翻译开始成为通晓外语者适合自身发展且又颇受欢迎的选项，而读者对“新小说”的热烈欢迎，则使媒体与书局看到了新生长的商机。“小说界革命”的巨大震撼力，使此后小说创作在总体上都变了样，几百年来的写作模式被改变了，视野已被开阔的读者也不允许创作再走回头路，而他们的欣赏口味又不希望作品如此地政治化，这是小说本体要求的一种表现，它有自己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决不会成为政治的附庸。于是在此后的光绪三十年（1904）至三十四年（1908）的五年里，创作出现了自小说有史以来的空前繁盛。作品的数量急剧地上升，创作题材前所未有地扩展，翻译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小说读者则迅猛地扩展为庞大的社会群体，为小说能较顺利地前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证。若无“小说界革命”打开步入快速道的大门，近代小说的发展绝不可能出现如此繁盛的局面，而正是这种繁盛的局面，改变了“小说界革命”所预想的小说行进路线。

其兴也勃，其衰也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小说界革命”必然地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不如此就无法撼动原有的小说发展体系，使其获得迅猛发展的契机；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它与小说本体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有相悖之处，

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较长久地持续，李亚娟的书稿正是从这一视角展现了那几年内近代小说的行进历程。正如充分肯定“小说界革命”的历史功绩时不可忽略其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一样，在考察“小说界革命”的影响迅速消退时，也不可因此抹杀其对近代小说发展的巨大推动。而且，还应该认识到，“小说界革命”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出现，这并非是梁启超一人之功。梁启超给《新小说》定下的宗旨是“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①，可是在《新小说》创办的一年半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创刊的《杭州白话报》已本此宗旨刊载小说，其风格贯穿始终，而且它有意突出了“通文字于语言，与小说和而为一”^②的特色。其时，除《杭州白话报》持续地刊载自著小说以开启民智、唤醒国人的爱国心外，还有些人则是通过翻译小说以达此目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忧亚子”的译作《累卵东洋》在东京出版，译者在自序中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得力于“政治小说之功”：“邦之先觉，谋有以布化之者，乃相率而纂译政治小说。不敷载而民智大辟，骤进文明国之权力，駸駸乎与欧罗巴诸大邦相拮抗。”翌年七月，“杞人”为“热诚爱国人（冯自由）”的译作《女子救国美谈》作序时，指出要开启民智，拯救国家危亡，“舍小说无由也”，“盖先导之术，至浅显而至切要也。”郑贯公的译作《瑞士建国记》赫

①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1902年8月18日）《新民丛报》第十四号。

② 《〈杭州白话报〉书后》，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三（1902年7月18日）《时报》。

然标为“政治小说”，赵必振所作序中先引西方哲学家之言：“入其国，问其小说何种盛行，即可以观其国之心人风俗、政治思想”，又指出英、美、德、法、日等国倚赖小说而振兴，“小说之功，亦诚伟矣”。这些都是在“小说界革命”之前就提倡政治小说的例子。在相关理论方面，严复、夏曾佑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即已问世，这篇长篇论文中“天下之心人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的观点，是后来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重要立论基础之一。^①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首先猛烈且系统地批判传统小说之弊的，应是北京的一个文学团体“小说改良会”，因囿于资料，该团体的具体情况目前尚不清楚，但它留存的那篇《小说改良会叙》^②，其立论与论述方式都和后来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基本一致。在光绪二十八年十月《新小说》创刊之前的几年里，改良小说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在各地都已开始出现，并渐成声势，这其中也包括梁启超本人的贡献。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自有其独到的思想在，但纵观前此诸相关史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小说界革命”所倡导的思想，实际上是将当时有关改良小说的各种见解作综合性的有机组合。由于先前发表这些意见的人一般都缺乏社会号召力，有些在今日

① 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七号刊载的《小说丛话》中写道，严复、夏曾佑之文连载时他已读到，“余当时狂爱之”。当他筹办《新小说》与撰写《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时，还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新民丛报》第十五号刊载“新小说报社广告”征集此文，以便写作时参考。

② 《小说改良会叙》，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1902年6月4日）《经济丛编》第八册。

甚至已无法考证其真名实姓，而同样的意思出自久负盛名的梁启超之口，却立时可激起巨大的社会反响。由此可见，政治与小说在晚清特殊的条件下行进轨迹渐行渐近并最终出现交叉点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由梁启超这样的政治家担当“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则更突显了其时改良小说的政治性需求。

政治与小说的相互关系，是近代小说研究中重要关节点之一，若无系统的清晰梳理，那么至少近代最后十年的小说态势、走向以及其间的各种曲折变化就无法解释清楚。李亚娟在这方面作了可喜的尝试，作为初入学术界的青年学者，其书稿难免还有可商榷之处，但她毕竟通过自己艰苦的努力，得以较系统地发表关于近代政治与小说关系的论述。在这个领域里，需要发掘的资料或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我希望李亚娟在已有的基础上作更深入的探索，为近代小说研究作出更多的贡献，我同样也寄希望于在这方面辛勤耕耘的学界同仁们。

陈大康

前 言

本书以光绪三十一年（1905）为转换点，以晚清最后十年间大量报刊刊载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以小说政治功用性的演变为线索，讨论在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之后，晚清小说的变化和特征，并探寻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

本书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问题的缘起及对中国近代小说史研究的回顾，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研究视角；此外还对相关概念、史料情况、研究方法以及论文写作思路等作了解释；本章最后对“小说界革命”前中国古典小说及近代传教士小说的功用性内涵作了简明探讨。

第二章至第五章为文章的主体部分。第二章题为“发现小说：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赋予”。中国近代小说的质变待到“小说界革命”赋予小说以政治功用性后才得以发生。在这一过程中，梁启超是一位枢纽性的人物。他不仅在思想上为晚清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而且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晚清小说的变化虽是各种因素交互着力的结果，小说的繁盛也并非梁启超一手独立造成，但其开创之功，其影响之深且广，则是不争之事实。本章从近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梁启超文学功用观的提出，梁启超的新小说理论以

及新小说内质的变化等几个方面，对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赋予进行了深入考察。

第三章题为“八股世界忽为小说世界：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扩展”。本章着重分析“新小说理论”在小说理论界和实际创作中的泛化。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的政治功用性在最大范围内得到扩展，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创作界无不对其纷纷响应。这一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文学观念转变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依靠的正是报纸、期刊、书局的鼎力合作。离开任何一方，晚清小说都很难在短期内获得如此繁盛之势。随着晚清小说的兴盛，晚清小说的分类也日趋纷繁。小说分类的势旺，又影响了各门类小说的写作，促进了晚清小说的发达。

第四章题为“娱乐压倒启蒙：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潮落”。光绪三十一年（1905）起，晚清小说格局开始发生变化，新小说在实际创作上与“小说界革命”理论主张渐行渐远，政治小说潮落，娱乐压倒启蒙，小说创作在娱乐性和政治功用性之间求新求变。此一小说格局的形成是小说政治功用性的缺陷、近代小说本身的完善以及小说作为文化消费品的特性，这三者交互着力的结果。

第五章题为“从介入到关怀：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新变”。光绪三十一年（1905）后，晚清小说呈现出新的格局，开口见喉咙的政治小说逐渐淡出，更具通俗娱乐性的小说逐渐兴起，表现为“娱乐压倒启蒙”；但小说的政治功用性，“小说救国论”并未因此消失，而是与小说的娱乐性一直处于博弈状态，最终形成了“立意高尚之书”与“消闲娱乐之书”既对立